

乐山郭沫若研究室编著

郭沫若 研究论丛



郭沫若研究论丛

第二辑

乐山师专郭沫若研究室 编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成都

出版说明

0598/13

今年(1988年)是我国文化巨人郭沫若先生逝世十周年,为了纪念郭老在政治、文学、历史、书法和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和卓越贡献,郭老的家乡——乐山师范专科学校“郭沫若研究室”的同志们,怀着崇敬和学习郭老的心情,组织编写了这本论文集,而且又在郭老的母校——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,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本书既是对郭老的最好纪念,又是为进一步研究郭老、学习郭老所做的一点贡献。

郭沫若研究论丛

乐山师专郭沫若研究室 编

※

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(成都四川大学内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大丰甫家印刷厂印刷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9 字数 176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500册

ISBN 7—5614—0124—8/I·18 定价: 1.75元

目 录

时代需求与历史选择·····	杨炳昆 (11)
——关于郭沫若与中外文化的思考	
郭沫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·····	税海模 (15)
郭沫若浪漫主义成因初考·····	李文遂 (34)
从《反正前后》看郭沫若思想认识的飞跃·····	李向阳 (47)
《凤凰涅槃》的语言艺术·····	杨 桦 (55)
语朴墨秀 辞意并工·····	谷辅林 周海波 (69)
——郭沫若传记文学的语言艺术	
郭沫若的“身边小说”兼及“自传”·····	江 源 (82)
火——大宇宙意志·····	罗 田 (102)
——试论《女神》中“火”的形象	
美的精神 善的灵魂·····	武 斌 (121)
——《虎符》纵横谈	
历史剧真实性新探·····	王文英 (136)
——从郭沫若的历史剧谈起	
《凤凰涅槃》与《海燕》象征手法比较·····	侯春树 (160)
中国甲骨学研究的里程碑·····	彭静中 (178)
——学习郭老的《卜辞通纂》等甲骨学著作	

关于郭沫若流亡日本的两首佚诗及诗后声明…罗星昊(214)

闪光的思想 巧妙的斗争……………秦 川(219)

——关于郭沫若的佚文《以新的团结迎接新的胜利》

热情的支持 难忘的回忆……………魏世萌(239)

记郭老对家乡中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

郭沫若鬻字轶闻……………贺锡翔(245)

时代需求与历史选择

——关于郭沫若与中外文化的思考

杨 炳 昆

郭沫若的青年时代，正是梁启超说的“学问饥荒”的年代。中国的传统文化满足不了青年知识分子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，于是转而求诸西方，出现了“究心泰西之学”的热潮，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学说都大量译介进来。郭沫若虽然正十二岁读私塾的时候就接触到“新的书籍”，但远远满足不了强烈的求知欲，因此一直处于“焦躁”与“空虚”的心理状态，迫切要求远走欧美日本，“这些地方发散着强有力的磁性，把我全身血液里面的铁质都吸引了去。这是一种不可遏抑的无名的憧憬。”（《反正前后》）所以到日本之后，便像海绵一样地吮吸着一切，既“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”，又觉得“于歌德思想有种‘共鸣之点’”，还深受惠特曼的影响；不但留意于西方众多的文学流派，而且“从此更被导引到老子，导引到孔子哲学，导引到印度哲学，导引到近世初期欧州大陆唯心派诸哲学家”。（《文艺论集》70页）。总

之，郭沫若这时对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，尤热衷于外来文化，思想十分庞杂。

这种现象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并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。佛教哲学，早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，但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悄无声息，突然在南北朝时空前繁盛起来，“佛经流通，大集中国”，“所在编民，相与入道”。（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）建康是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，洛阳则“昭提栢比，宝塔骈罗”，“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。”（《洛阳伽蓝记》序）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。大凡历史上和平发展时期，中外文化交流，主要是文学艺术、科学技术等深浅的内容。因为那时的社会生活是安定的，社会心理是满足的，传统的意识，观念地位牢固，外来的思想不容插足。人们需要引进外来文化只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，不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文化，所以宗教、哲学、伦理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很难找到市物。可是，在社会大动乱或历史变革时期情况就不同了，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解释不了新现象，回答不了新问题，人们就只好摒弃旧的思维方式，去寻找新的出路。所以，到东汉末年，思想界便发出了“叛散五经，灭弃风雅”（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）的反儒学传统的呼声，因而有玄学的兴起，禅宗的昌明。可见，新思潮的出现，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。在这种社会思潮大变革的时代，谁能够博采众家，汇通中外，谁就成为时代的骄子，思想界的巨擘。

在中国近代思想界，从谭嗣同的“冲决网罗”到五四时的“打倒孔家店”，就代表了这种反传统的思潮，一时“史学革命”、“诗界革命”等口号纷起。可是，在文学领域

里，黄遵宪等人的“诗界革命”，只是引进了一些新名词，从思想境界到表现手法依然没有突破旧体诗词的藩篱。林译小说也只是译介而非创作。因此，当郭沫若的全新的诗体登上文坛，立刻便收登高一呼，四山响应之效。《女神》成了新诗的奠基作，也成了郭沫若的成名作。

《女神》是全新的诗，因为它是彻底反传统的，是“洋味”十足的。且不说郭沫若自己承认：“我的《凤凰涅槃》、《晨安》、《地球，我的母亲！》、《匪徒颂》等，便是在他（指惠特曼——引者）的影响之下做成的。”（《创造十年》）我们只要翻开《女神》诗集，便可看到，那里全面是欧洲启蒙时期个性解放的狂烈呼号，一反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，在思想境界上便全然不同了；《女神》几乎都是宏观的思考，而一反微观描写的旧诗格调，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也全然不同了；例如用“床前明月光”表现乡愁，用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表现了无穷惆怅，这种具体形象的表现手法与“立在地球上放号”吞月吞日的“天狗”便是不同的思维方式。至于格式、语言，更是旧体诗词所未见的；甚至直接使用外文词汇，在当时也透着几分新鲜感。闻一多说：“若讲新诗，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，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，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。”这个时代精神是什么，也就是闻一多批评《女神》时所概括的，“过分欧化”与“薄于东方文化”。

历来论者把这个评论视为《女神》的缺点，其实这也是《女神》的特点。不如此，就不会产生“突破”感。郭沫若很强调创造，创造就是对传统的突破。从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看，对传统的突破和超越，总是首先从对民间的和他民族

的（包括国内和国外）文艺的移植，借鉴、模仿开始的，经过了消化后才有创新。突破当然可以是反传统的或发展传统的两种走向，但发展传统许多时候也要呈现出反传统的形式。

不少文章在承认《女神》是外来文化的产物时，同时又强调传统文化的影响。但是，《女神》的营养来之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的远比唐诗宋词为多。这种返古的倾向，本身就是对现实传统的否定，也是一种反传统。所以，《女神》的时代精神和艺术特征，可以概括为反传统主义。正是这种反传统的精神，在当时青年中博得如此热烈的反响。

近代思潮的特征，就是反传统主义的。鸦片战争以后严酷的国际国内现实，逼使一些先进人物“开眼看世界”，发出“师夷长技”的呼声。但是，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传统，提出了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折衷方案。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，要求突破传统的呼声越来越高，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便是其极端。传统的思想武器被否定了，就不得不借助外来的思想武器，于是庸俗进化论，新康德主义、无政府主义等等就乘虚而入了。西方思潮在东方土壤里萌发，不仅是饥不择食，也因为中国具有了与欧洲相同的社会条件—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。梁启超回忆当时输入西学是“无组织，无选择，本末不具，派别不明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的浑沌状态，毛泽东也说：“那时，求进步的中国人，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，什么书也看。”

“我自己在青年时期，学的也是这些东西”。（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）接着，他又指出：“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，即所谓新学，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，

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。”（同上所引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学与封建主义旧学的对立，就是当时反传统主义的新思潮的实质。

所以，郭沫若之成长为中国的“现代第一诗人”（闻一多语），从此奠定了他在新文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，全在于他大胆地借鉴甚至模仿外来文化，勇敢地彻底抛弃传统。当旧文化走上死胡同的时候，这是一条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。我们只要放开眼看看近代中国的各个文化领域，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、哲学、史学……所谓资产阶级的新文化，无一不打上“舶来品”的标志。当时青年中“有一种欧化的狂癖”，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趋动力，是应该肯定的，不如此，是不能把根深蒂固、枝繁叶茂的封建主义旧文化翻过来的。今天我们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则可，如对这种狂癖”加以否定，就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了。

自然，郭沫若借鉴西方的新诗不免囫圇吞枣。本来他可以在探索的道路上自我提高的，但是他的生活道路却历经曲折，大量的社会活动，长时间古史研究，使他不可能对新诗的发展作深入的探索。因此，他以后的新诗再也不能超越自己建造的高峰；愈到后来，他写的旧体诗词也愈多，虽然不乏佳作，但中国的旧体诗词已发展到顶巅，后来者不过是替泰山垒土而已，不会有新的突破。

郭沫若另一个成就最大的领域是先秦史研究，这方面比之新诗创作显出成熟的光彩。自梁启超等人提出“史学革命”的口号，猛烈打击封建旧史学是“帝王家谱，”企图建立进化史观的新史学体系以来，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实绩。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，对中国古史资料（包括文

献的和实物的，如甲骨文、金石文等）——重新审视之后，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，在中外文化的结合上做出了典范。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威力，同时从时代上说，人们经过学习西方的狂热之后也开始成熟起来了。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导，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实证的科学方法，并运用了文字学、音韵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、生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所研究古代的人物和事件，因而多所阐发。王国维借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，是因为他借用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科学方法，“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故也”。（王国华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·序》）郭沫若更进了一步；他不但“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”，而且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“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，中国社会的发展，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。”（《海涛集·跨着东海》）所以，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成绩，是他汇通中外的结果。

如果没有西学的输入，会不会产生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巨人呢？郭沫若正是代表了时代的需要，在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中做出了杰出成绩者。

二

过了半个世纪，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，持批评态度者日渐增多，青年人更加发出“不理解”的叹息。批评者之多，本身就说明了郭沫若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巨大影响；试问对二三流作家，谁会有多大的兴趣去纠缠他的是非得失？而且批评的展开，也有利于对郭沫若的研究，对中

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。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。

对郭沫若持批评态度者中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但不可否认，郭沫若的文学作品，对青年人的影响愈来愈小。现在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只有《雷电颂》一篇，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，也只有《天上的街市》。郭沫若的史学研究，也受到了许多非难。

就诗歌来说，当年引起激荡的《女神》，今天的青年竟会感到兴味索然。差别为什么如此之大？因为对于文学遗产的继承，不外思想意义与美学价值两个方面。除了离情别绪、生恶死哀这些普遍的人生体验不受时代的限制，可以引起千古共鸣外，时代性愈强的文艺作品，它的时空限制也就愈强。岳飞的《满江红》陆游的《示儿》、洗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对于饱受民族苦难的青年曾经发出震撼人心的效果，但对今天的青年，效果就不那么强烈了。因为今天的青年更多的是拼搏与竞争的超越感，却缺少苦难中挣扎的义愤感。他们读《女神》，也就有了时代的隔膜。这种隔膜，不是通过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可以消除的。也就是说，时代体验也是一种深刻的内心感受，很难用进入角色的方法来激发情感。《女神》那种彻底否定旧事物，热烈期待新事物的革命精神，新旧不两立、黑白不混淆的截然态度，热烈、执着、粗犷的激情，都不是生活在改革时期的青年所能体味的。《女神》既然在思想、情感上与现代青年有了距离，而且审美价值也不符合今天青年的胃口。《女神》的艺术表现手法，完全是从属于她的思想感情的。她那雄浑的气魄、豪迈的格调，自由的旋律、奔放的语言，与她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相结合就恰到好处；如果与其内容剥离开来，不失之空就

失之粗，所以今天青年读起来就觉得缺乏回味。文艺的形式是不能孤立发展的，汉赋一变而为六朝骈文，但把那个时代一过，内容被抛弃了，形式也被否定了，继承下来就只有对偶句，排比句这些细微末节了。所谓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文艺发展的规律吧。

从郭沫若自身看，就不能看到“过分欧化”的局限性了。前文从突破传统的角度肯定了“过分欧化”，因为那是时代的需要。但历史是有选择权的，淘汰律总是以审美价值的高低为依归的。刘勰说：“言以文远，诚哉斯验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情采篇赞》）换句话说就是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否则，文学家怎么又叫艺术大师呢。当然，审美价值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，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，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，不但艺术上完美，思想上也有可取之处。《女神》在艺术上还是一种探索性的创作，是新诗起步时期的又一个“尝试集”。所谓“过分欧化，”就是“消化不良，”还不成熟。郭沫若是主张“自然流露”说的，此说虽有积极意义，但影响了他在艺术上的探索。《女神》突破了旧诗格律的传统，在当时别开生面；但过分欧化，却忽视了中国诗歌的意境美，辞藻美、韵律美、以及文字排列的形式美等从汉族语言，文字的特点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，违背了中国大众的欣赏习惯。例如，汉字方块形和一字一义的特点，就现中国的诗歌具有书写格式美和语言对称美，从《诗经》到现代诗人的自由体，都大体注意到形式上的整齐排列。宋词元曲，最初是口头唱的，比较自由，一旦由文人写进书面，就形成了有严格限制的“牌子。”中国的诗歌，不但有可供“听”（歌唱，朗读）的功能，还有可供“看”（默读）的

功能，甚至“看”是欣赏诗歌的主要形式，把文字信息转化为图像信息，因而才有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的说法。不但诗歌要求书面形式美，就是对联、题赞、谜语、童谣、成语……都具有语言对称与书面整齐的特点。加以民族心理上也是以对称、和谐为美，建筑按中轴线对称排列；衣服讲究对襟，即使左衽、右衽，也必须以大襟与小襟调节；饮食习惯方面，所谓“吃香的喝辣的”，必定吃喝并举；甚至语言习惯上，也必“兄嫂”、“兄弟”对举，单指时也要用“兄长”。这种以对称为心理平衡的习惯，对诗歌的格律要求就极严。而《女神》恰恰是追求格律，形式上的自由的。今天常举《女神》艺术性的例子，如《女神之再生》的最后合唱：

太阳虽还在远方，
太阳虽还在远方，
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：
丁当，丁当，丁当。

万千金箭射天狼，
天狼已在暗悲哀，
海水中早听着葬钟在响：
丁当，丁当，丁当。

我们欲饮葡萄觥，
愿祝新阳寿无疆，
海水中早听着酒钟在响：
丁当，丁当，丁当。

就恰恰是遵循了格律、形式、音节上整齐的要求。但这种例子，在《女神》中并不多见。此其一。

其二，汉语意会的特点，使许多语法成分处于若隐若现的地位，只起语法作用的虚词不是构成汉语的必要成分。不但书面语言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这样完全没有虚词的句子毫无晦涩之感，就是省去了任何语法关系的，如“花花草草”、“不三不四”这样的口语，也是明白晓畅的。再加以汉字的信息量大，一个字可以有多种意义和用法，两个字组成新的词就千变万化。例如“年年难唱年年唱，处处无家处处家，”全句只用了极普遍的六个字，不同组合后却概括了极丰富的生活内容，蕴含了极复杂的思想感情。汉语这样的特点，就要求诗歌的文字浓缩、凝炼，诗歌的语言要概括力强，富于表现力，有丰富的信息量。这样才会产生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效果，耐人寻味。否则就会浅、显、露。郭沫若“自然流露”的诗歌，就失之锤炼。这大概也与西方人直率，东方人含蓄的性格有关。例如，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”斩钉截铁、掷地有声；可是中国人就不这么侃切了，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！”偏要来个“者也”，缓和一下语气。像《天狗》中“我把月来吞了，我把日来吞了”这样的语言，就只有气魄，却缺少含蓄和凝炼。这就是“薄于东方文化”的表现。

其三，中国诗词讲究意境。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主观体验是通过客观描写来表达的。但是郭沫若主张主观精神的直露，因而在他的诗中有含义，有意象，却缺少意境，更多的是呐喊式的呼号。这呼号，在五四时期有震聩

发聩的作用，却缺少咀嚼的余韵。西方诗歌重视直接抒情，富有哲理；中国诗词则主张“含而不露”，像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这样富于哲理的名句，也是间接表现的，是利用了汉语信息量大的特点而采用“双关意”的写法。

当然，以上三点，不是说西洋诗就完全没有，如有规则的排列形式，西洋诗也讲究，但不如中国那么严格。另一方面，也不是要求新诗在这些方面完全与旧诗一样，那样还有什么新诗、旧诗的区别。但是，旧诗的这些优点，是由汉语语言文字的特点，汉民族的心理特点与审美习惯形成的，它不同于封建性的糟粕，因此新诗的发展就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。

关于郭沫若的史学研究，有许多成果具有权威性，至今还为史学界所崇仰。特别是他把古史研究引向经济史、社会史的广阔领域，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古代中国，真正起了史学革命的作用。他对某些史料的运用方法，也开启了人们的思路。至于某些论断，现在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，也属于正常的学术现象，即使郭沫若的论断错了，也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，就好比人们不会用今天的宇宙观去非难日心说的偏颇。所以，用现在的新成果，去否定郭沫若昨日史研究的意义，是不恰当的。但是，在方法论上，郭沫若有失误的地方，这是我们应当吸取教训的。

一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问题。儒家的入世精神，使中国的学术界有“经世致用”的优良传统，突出了“文以明道”的功用。郭沫若继承了这个传统，而且他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时候，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自觉

的革命者，所以他的史学研究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。这无疑是正确的。问题是出在如何使历史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上，是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指导现实斗争，像《甲申三百年祭》那样，还是把历史研究直接服从于某种政治目的。例如，对秦始皇的评价，在四十年代，他“存心用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。因而对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。”）《郭沫若剧作全集》）第二卷255页，《高渐离》校后记之二）对杜甫与李白的研究，也是用“阶级分析”代替对人物的历史评价和作品艺术评价（见《李白与杜甫》）这种把学术研究作为政治目的的手段，就常常造成思想性与科学性的悖反。虽然郭沫若已作了某些纠正，如对秦始皇的评价，但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上，把思想性与科学性分离而不是统一的做法却是有影响的。在文艺评论中，至今还有只谈思想性，回避艺术性的做法，也是一种影响。

二是历史研究的结论从何而来。毛泽东指出：要做到实事求是，“就须不凭主观想像，不凭一时的热情，不凭死的书本，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，详细地占有材料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，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。”（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）郭沫若正是这样去研究先秦史的。他说：“秦汉以前的材料，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。考古学上的、文献学上的、文字学、音韵学、因明学，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，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。”

（《沫若文集》卷十五492页）因而他作出了许多科学的结论。但是，这种态度，他又未能贯彻始终。例如，他“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”，“凭自己的好恶”去评价历史人物（谢保成：《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》，载《郭沫若